

## 缅怀方国瑜教授

李希泌

方国瑜教授是我国出身于纳西族的著名的历史学家。他研究云南民族史、西南历史地理和纳西象形文学，卓有成就。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遽樱脑溢血逝世，享年八十一岁。方先生的逝世，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。方先生生前对本刊颇为关怀，和我有通家之谊，谨撰此文，以志缅怀。

我和方先生论交，始自1935年。时方先生任职于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这年七月，方先生来苏州向我父亲请教云南的历史地理问题。他和我父亲谈及他的近著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拟向章太炎先生请教。我父亲叫我陪同他去拜谒章先生。他给章先生介绍了纳西象形文字概况。章先生很感兴趣。章先生翻阅了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稿本之后，欣然允为撰序。时当三伏，章先生伏案挥汗疾书，晷刻之间，撰就序文，并囑方先生结合殷周古文字多作研究。章先生在序文中阐述了他的“汉族出自西羌”的论点。他认为方先生的这部著作足为他这一论点的左证。他进一步指出：“异日转益穷究，所得当较今兹愈广，于以辨章种姓，追溯系世，使外人拟议之词，一旦廓清都尽，岂不快哉！”于以见章先生对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之重视。

在这以后的四十余年间，我和方先生的来往，未曾间断。1982

年冬，我左腿骨折卧床。适方先生来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他双目失明，由两位工作人员搀扶亲临舍间慰问，使我深感不安。方先生对我说，他已请求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要再选他当代表，以后可能不再来北京了，特来告别。我安慰他说：

“等我腿伤恢复后，我会到昆明来看您的。”相对嘿然。万没有想到这次会见，竟成永诀。方先生除双目失明，胃做过切除手术以外，体质尚可，噩耗传来，颇感突然。据方先生的助手徐文德同志函告，方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天（十二月二十三日）上午，和云南大学历史系江应樑先生商谈编写《中国少数民族史》事宜，甚为兴奋，几次激动地挥舞着手。江先生走后，方先生叫他的研究生读一篇文章给他听。他突感不适，说头部右侧疼痛不已。不久，即陷入昏迷。在昏迷中，尚喃喃念着“云南地方史……”之语。延至次日上午八时心脏停止了跳动。方先生在弥留之际，还关心着云南地方史，遑闻之余，为之感动泪下。

方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，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、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与考订，方先生研究西南史地积数十寒暑。西南自西汉设郡县以来，政区常有变化。唐、宋两代在云南曾先后建立“南诏”、“大理”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，与中原分庭颉颃，其势力扩展到了四川。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兄弟民族也比较多。但文献不足征，前人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。方先生有鉴于此，决心深入研究。经过长时期的收集、积累和整理历史资料，四易其稿，写成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一书。全书分六篇，共百余万言。方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全面地考释了自西汉至明清的西南地名，充实了这方面研究的薄弱环节。他把西南历史地理有机地放在全国范围之内加以研究，论证了西南在历史上与中国版图不可分割性。

方先生在研究西南地理的同时，从事云南书名、地名、人名、年代与历史事件的搜集与整理的工作。他根据搜集与整理的资料，

写成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一书，共十卷，一百余万言。全书共列八百余目，按时代顺序，分门别类地对几千种有关专书、专篇、专条的作者、著作年代、资料来源及其价值，一一加以详细考说，对云南史料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。

方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曾亲自参加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的编纂工作。这部通志在解放前夕已出版，下限至辛亥革命为止。方先生将修志时看到的抗日战争滇西战役资料编写《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编》（未刊印）。这给目前云南省志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

方先生晚年致力于编纂《云南史料丛刊》。1981年，他曾对我说：与其花费时间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工作，不如踏踏实实做点有益于研究云南地方史的工作。方先生编纂《云南史料丛刊》之目的在此。由于这一工作是少数人出力而多数人便利，故在质量上努力做到搜集资料完备，校录原文确实。每篇资料前有概说，后有校记，俾研究者使用时信得过。已陆续刻印五十六辑，共六百余万字。

在方先生所制定的八年规划（1978—1985）中，除上述工作外，尚有云南历史资料编年与编写云南地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等各方面的专史等等。云南历史资料编年，即编录、解释、鉴别、评论和整理云南历史资料。方先生对这项工作拟定四条要求：一是纂录长编，不写定本；二是专题记述，略具本末；三是明辨异同，评论是非；四是专题辑录，作为附篇。方先生对完成八年规划，充满信心。他在《滇史论丛·自序中》写道：“瑜年迈力衰，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，尚无迟暮之感，当与诸同道者龟勉从事。犹盼完成八年规划之后，尚得余年，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，勿负此生矣。”但事与愿违，八年规划尚未完成，方先生就溘然长逝了。

二、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：云南是多民族的地区。1954年周

恩来总理到昆明，视察云南大学，指示该校历史系教学科研，应重视地方特点，出人才，出成果。该校遵照周总理的指示，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，由方先生主讲。他的讲义已编印为两厚册。次年，该校设立民族史专门组课程，先后成立研究室、研究所机构。这正如方先生所指出的：“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，二十五年来，已渐有繁荣景象”。云南民族史出现繁荣的景象，和方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方先生研究云南民族史的著作，有《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》与《彝族史略》等。

三、纳西象形文字的研究和整理：方先生的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稿本，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初期，经顾颉刚先生等多次催促问世，但迄未出版。直至1972年，郭沫若先生看到了方先生的这个稿子，责成方先生早日修改，以便影印。同时，调纳西文字专家和志武到昆明，协助方先生工作。经过七年的努力，到1979年全稿修改完毕，1981年，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整理成辞典出版的，尚寥寥无几，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是其中的一种。在旧中国，我国很多珍贵文物，被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偷运出国。云南丽江用纳西文字写的东巴教经典也未能逃此厄运。现在美国尚藏有一批东巴教经典。1981年冬，美国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方先生访美，协助他们整理这批东巴教经典。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同志访问方先生商谈此事时，我适在座。方先生以双目接近失明，出远门不便，对美国的邀请婉言辞谢。方先生推荐他的助手代替他去。

我与方先生论交四十余载，从与方先生的交往中，体会到方先生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一、方先生好学刻苦，持之有恒，锲而不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方先生曾对我说，他的一生就是读书、教书、著书，总而言之，离不开一个书字。这是方先生对自己一生真实的概括。回忆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方先生一家和我们家都住在昆明郊区普平村。他协

助我父亲编《永昌府文征》。时敌机空袭频仍，加之物价飞涨，栖遑不可终日。方先生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，仍手不释卷。更难得的是方先生这种锲而不舍的好学精神，数十年如一日。

二、方先生治学，反对好高骛远，华而不实。他坚持做最基础的资料工作，力求做到详尽地占有资料。

三、方先生治学，本乎实事求是的精神。他以“不淹没前人，胜过前人”自勉，力求做到摆出事实，讲清道理，事分主从，明辨是非。

四、方先生治学谨严。他写文章，要反复修改多次，才定稿发表。如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》中刊载的方先生所写《略述治学经历》一文，前后寄来三稿，至第三稿始为定稿。

方先生在政治上要求进步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。他作为一个纳西族，以维护祖国统一，民族团结为己任，并贯穿于他的教学和研究之中。解放以来，方先生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，从切身的体验里，深深体会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。他把个人的命运同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1980年3月，他写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，字字句句，出自肺腑。方先生去世后，经云南中共省委批准他为中共党员。方先生多年所向往者，如愿以偿，方先生地下有知，必当含笑九原。

附记：方先生的生平及著作详阅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》第三辑方国瑜《略述治学经历》

